

言子的礼学造诣及其对吴地文化的影响

吴蕴慧

言子,名偃,字子游,又称叔氏。生于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歿于贞定王二十六年(前443年),出生于吴地常熟境内以先贤仲雍命名的虞山东麓。曾到鲁国就学于孔子,少孔子45岁^①,为孔子晚年学生,也是孔门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被誉为“北学中国,南方一人”。吴地人士常将言子与泰伯、仲雍相提并论,并自唐宋以来,奉言子为文学礼仪之先贤,称言子为“亲受业于孔子,传圣学以淑诸乡人,一洗其陋而归于儒,其功不在泰伯下”^②。

孔子授徒,“以诗书礼乐教”^③,设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四科中学业优异者共10名,即“十哲”。“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④言子因名列第九,故后人又称为“十哲人中第九人”。

在孔子众多的弟子中,言子“特习于礼,以文学著名”^⑤,礼是言子研习的重要内容,据《孔子家语·弟子行》云:“先成其虑,及事而用之,故动则不妄,是言偃之行也”;“欲能则学,欲知则问,欲善则详,欲给则豫。当是而行,偃也得之矣”^⑥。可知,言子所学成就颇高。

一、言子的礼学造诣

1、言子谦虚好学,求知欲强,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治学态度,善于钻研,敏于思索,凡事追根溯源,探求究竟,终获礼学真谛。

周公所作之礼在距其不远的春秋时期,就早已礼崩乐坏。连孔子本人也不得不感慨:“於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⑦言子在学习和实践礼的过程中,不拘泥于书本,将其所闻、所见与所思、所感相结合,凡有困惑或疑问,总是及时请教孔子,寻求甚解。《礼记·檀弓上》载:“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犹行

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口盾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⑧面对檀弓和伯子在立嫡孙还是立庶子分歧上,虽然伯子很显然是在为公仪仲子打圆场,但谨慎起见,言子还是就此事特地请教老师。此外,言子还就“丧慈母如母,礼与”^⑨、何为“孝”^⑩等问题专门请教孔子。

比起同门众生,言子可谓是勤奋好学之致了。言子请教孔子总喜欢探根究底,穷事尽理。“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言子问丧事应该怎样操办?孔子说:“要跟家里财力多少有无相称。”那么“有亡”又该怎么掌握分寸呢?于是言子进一步问:“有亡恶乎齐?”夫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⑪《礼记》中记录言子问学时使用“复问”、“进问”较多,可见其发问之多、之深入。《礼记·礼运》:“言偃复问曰:‘如此乎礼之急也?’”^⑫又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⑬仲尼燕居,子张、子贡、子游侍,纵言至于礼。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语女礼,使女以礼周流,无不遍也。……子贡退,言游进

①④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01、2185页。

②徐缙:《学道书院记》,《吴县志》卷27《书院》,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403页。

③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第1938页。

⑤《四库全书》卷84《史部·别史类·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⑥王肃:《孔子家语》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⑦⑧⑨⑩⑪⑫⑬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4、57、252、100、289、290页。

⑩《诸子集成·论语正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曰：“敢问礼也者，领恶而全好者与？”^①

正因为如此，言子才能深谙师道，深得孔子学术和思想的精髓，终获真传。曾子曾与言子在夫子处俱闻“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之言，曾子便断章取义地将其告诉有子，而言子却善于分析和揣度，以为夫子是在特定环境下皆有所指：“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②此事足以证明言子深谙孔学真谛。

2、言子能深刻领会孔子礼学思想精髓，躬亲实践，造诣深厚，其礼学成就远超同门弟子。

言子习礼并非机械模仿、简单套用，不仅在形式上墨守礼规，而且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灵活运用，把握礼之本，在实质上恪守礼义。传统的礼仪典范虽然使得社会个体举手投足均有“礼”可循，但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情况却是千差万别，如未能把握礼义精髓而照本宣科，便会有悖礼义。《礼记·檀弓上》记录了曾子和言子的一番争议：“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主人既小敛，袒，括发，子游趋而出，袭裘、带、经而入。曾子曰：‘我过矣！我过矣！夫夫是也。’”^③据《礼记集解》：“凡吊者，主人未变，则吉服，羔裘、玄冠，缙衣、素裳，又裼而露其中衣；主人既变，则袭而加经、带，其冠与衣犹是也；主人既成服，则服吊衰。”^④曾子穿着羔裘去吊丧，言子露着内衣吊丧。曾子于是在众人面前嘲笑言子。等到主人完成小敛，袒露内衣，用麻带束发，这时言子快步跑到外面，穿着吊丧的裘、带和经进来了。曾子这才恍然大悟。又“小敛之奠，子游曰：‘于东方。’曾子曰：‘于西方。敛斯席矣。’小敛之奠在西方，鲁礼之未失也。”^⑤曾子又错了，小敛后将供奉的酒食放在死者的西边，这是鲁国末世礼节上的失误。与被孔子同列一科的子夏相比，言子不仅文学成就排名在前，礼学方面也略胜一筹：“卫司徒敬子死，子夏吊焉，主人未小敛，经而往。子游吊焉，主人既小敛，子游出经，反哭。子夏曰：‘闻之也与？’曰：‘闻诸夫子：主人未改服则不经。’”^⑥

礼乐教化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礼记·乐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⑦言子对礼乐教化不仅理解透彻，而且学以致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宰牛刀？’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

戏之耳。’”^⑧孔安国《史记集解》对言子所说“道”进行了阐释：“道谓礼乐也。乐以和人，人和则易使。”言子的武城弦歌将孔子的礼乐教化运用得心应手，赢得了孔子的高度评价。

3、言子对于礼学见解独到，恪守礼义，是非分明，成为名重一时的礼学顾问。

言子的礼学造诣使他在当世就已脱颖而出，并能以大师的眼光和高度激昂礼义，抨击时弊。言子恪守礼义，就事论事，对贵族阶级失礼乱义之举毫不妥协。“司寇惠子之丧，子游为之麻衰，牡麻经，文子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敢辞。’子游曰：‘礼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趋而就诸臣之位。文子又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敢辞。’子游曰：‘固以请。’文子退，扶适子南面而立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虎也敢不复位。’子游趋而就客位。”^⑨卫国贵族司寇惠子死了，家中办理丧事，由于没有把嫡子虎作为丧主，言子特意身穿着吉布做的麻衰，而头缠着齐衰服用的雄麻经，腰束着齐衰服用的雄麻带，前去吊丧。言子不承认文子具有丧主资格，不就西边面朝东的客位，而跑向门东面朝北的家臣的位置，以示不满。直到文子意识到自己失礼，扶着嫡子虎面朝南地立于丧主的位置上，言子才回归正位。“叔孙武叔之母死，既小敛，举者出户，出户袒，且投其冠括发。子游曰：‘知礼？’”^⑩依礼，作为丧主，应该在为死者包裹扎束后就接着袒臂括发，且须亲自参加抬尸出户才是。鲁国贵族叔孙武叔的失礼行为遭到了言子的讥笑。“将军文子之丧，既除丧而后越人来吊，主人深衣练冠，待于庙，垂涕洟。子游观之，曰：‘将军文氏之子其庶几乎！亡于礼者之礼也，其动也中。’”^⑪卫国将军文子之子的“非常礼”得到了言子的认同和赞许。

言子名重一时，俨然成为当世的礼学顾问。公叔木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不知该穿什么丧服，便问于言子。言子曰：“其大功乎！”^⑫又，司士贲告于言子曰：“请袭于床。”言子曰：“诺。”^⑬虽然县子听说此事，以为“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然而言子的狂妄与自信却来源于其礼学权威的地位。

4、言子在秉承师教的同时，勇于创新。对于孔子的思想和学术，言子不是简单因袭，而是有所消化、理解、发

①②③⑤⑥⑦⑨⑩⑪⑫⑬王文锦：《礼记译解》，第742、93、84、98、125—126、546、85—86、89、86、96、100页。

④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4页。

⑧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2201—2202页。

挥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念。

据郭沫若《十批判书》:“《礼记·礼运》一篇,毫无疑问,便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①言子委婉地道出了“大道小康”之高论。

言子认为制礼应有节。《礼记·檀弓下》:“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谓之礼。人死,斯恶之矣;无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绞、衾,设萎、鬻,为使人勿恶也。始死,脯醢之奠,将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见其飧之者也。自上世以来,未之有舍也,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礼者,亦非礼之訾也。’”^②有子不理解丧礼中所规定的跳脚,并打算把这种礼规除。言子却见解独到:“礼中,有凭着仪节节制感情的,有借着外物唤起感情的。放纵感情而举动粗率的,那是落后民族的表现方式。礼的表现方式就不是这样。人遇见喜事就高兴了,高兴起来就歌咏了,歌咏起来就会摇摆身体,摇摆起来就要手舞足蹈了;恼怒起来就会悲戚,悲戚起来就会哀叹,哀叹不足以发泄就会捶捶胸,捶捶胸不足以发泄就要顿足跳脚了。把这些变化不定而又有一定联系的情感和行动,按品类加以节制,这就叫做礼……。”因此,言子认为“丧致乎哀而止”^③,治丧能充分表达悲哀也就够了,要真情流露,切忌刻意模仿、矫情逾礼。

言子对丧礼的服饰和过程也有自己的看法。“参分带下,绅居二焉,绅鞮结三齐。”^④“既祥,虽不当缙者必缙,然后反服。”^⑤

在为人处事的礼仪哲学中,言子进一步发挥了中庸之道,认为“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⑥,侍奉君主过密烦琐,就会招致侮辱;结交朋友过密烦琐,就会被疏远。

在教书育人、传道授业方面,言子认为应先本后末,要把精髓的“道”传授给学生。言子曾评判子夏所教的学生“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⑦。认为子夏的学生,担当打扫清洁、接待客人、按礼进退,那是可以的,不过这只是小节罢了,道的根本却没有把握住。

二、言子对吴地文化的影响

1、言子开启了吴地礼乐教化、崇文尚教之风。

泰伯、仲雍远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⑧。初到吴地,据《左传·哀公七年》记载:“太伯端委以至周礼,仲雍嗣之、断发纹身、羸以为饰、岂礼也

哉。”^⑨泰伯的穿戴尚沿袭周族,并试图推行周族的礼制,到了仲雍时,便因地制宜地“断发纹身”了。泰伯和仲雍给吴地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明,主要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在强大的吴地土著文化的冲击下,礼仪风俗上更多地还是入乡随俗。如果说泰伯的“周礼”是对吴地礼仪教化的启蒙,那么,真正意义上开启吴国崇文尚教之风的当推言子。

言子早年师从孔子研习儒礼,晚年回吴讲学,把中原的发达文化带回江南,四处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圣贤道被天下万世尤深于所生之乡,惟吴古为荆蛮,文身渐发,混于龙蛇,自泰伯之至德,延陵之高风,俗始一变,迨言公北学,而孔子之道渐于吴,吴俗乃大变,千载之下,学者益众,家诗书而户礼乐,东南学道之宗实言氏启之。”^⑩。

言子还独具慧眼,任用澹台灭明。澹台灭明早年投于孔子门下,却遭拒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⑪言子却认为其人为端正,不对上司拍马奉承,是可重用之才。“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⑫后来,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⑬,成为享誉江南的一代名师。

自此以后,吴地由“尚武”转向“崇文”,由“野蛮”转向“重教”。读书、教书、藏书风气日盛,人才辈出。吴地状元之多在全国名列前茅,据有关资料统计,明朝自洪武四年(1371)至崇祯十六年(1643)的前后 272 年间,全国共录取文状元 90 名,而仅苏州一府就产生出状元 8 名,约占全国状元总数的 9%。清代吴地状元则更多。自清顺治三年(1646)开科取士,至光绪三十年(1904),其间 258 年,全国共录取文状元 114 名,单苏州一地即出状元 26 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 22.81%,占江苏全省状元总数

①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4 页。

②④⑤王文锦:《礼记译解》,第 129、419、602 页。

③⑥⑦⑩《诸子集成·论语正义》,第 105、25、104、34 页。

⑧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第 1445 页。

⑨《春秋左传正义附校勘记》卷 58,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009 页。

⑩徐缙:《学道书院记》,《吴县志》卷 27《书院》,第 403 页。

⑪⑬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 2205—2206 页。

的53.06%，无论是平均数还是绝对数，均为全国第一，是名副其实的“状元之乡”^①。如今，吴地又成为“教授之乡”，国学大师、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外交家等名家百出。言子在开启吴地礼乐教化、崇文尚教之风方面功不可没。

2、言子开启了吴地锐意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

言子出生直至北游从学这段时间内，正值吴国多事之秋，战争频仍。公元前506年，吴大举攻楚，攻入楚都郢。公元前496年，吴伐越，战于李，吴师败，吴王阖闾负伤而亡。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败越于夫椒，又乘胜攻入越都。越王勾践向吴求和。公元前486年，吴人进犯中原，鲁、邾等国纷纷臣服。公元前485年，吴从海上伐齐；次年，又兴兵伐齐，大败齐师。

也许正是怀揣着改变动荡政局的愿望，血气方刚、满怀激情的言子负笈北上，师从于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屈指可数的大师，并且在前后长达14年的时间里追随恩师周游列国。他勤奋钻研、善于思考、务实求真、执着进取，在秉承师教的同时，不断地发明、创新，终于学有所成，成一代宗师。

言子善于摆脱狭隘的视域和地域羁绊，用自己的勤奋与睿智、务实与求真、开放与进取、创新与超越谱写着吴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孕育着吴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作为言子故里的吴地能在两千多年的坎坷发展中，由不为人齿的蛮夷小国一跃而成为如今中华大地长三角地区一颗璀璨的明珠，这也绝非偶然。

据《光绪常昭合志》：“唐开元八年，以十哲从祀；二十七年，追赠吴侯。宋大中祥符二年，赠丹阳公；咸淳二年，改赠吴公。元大德中，封吴国公。明嘉靖中，改称先

贤言子。国朝因之。康熙五十一年，恩准设五经博士一员，世袭罔替。”^②宋代朱熹亲自为吴公祠撰记，称“公生其间，乃独能悦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学于中国，身通受业，遂因文学以得圣人之一体，岂不可谓豪杰之士哉”^③，并感慨“岂所谓南方之学得其精华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④。清代康熙、乾隆南巡，曾先后赐匾额“文开吴会”、“道启东南”^⑤。雍正间，方伯鄂尔泰又建石坊，题曰“南方夫子”^⑥，自此以后，“南方夫子”的盛誉便成为言子对吴地文化影响的象征与诠释。

作者简介：吴蕴慧(1977 -)，女，江苏南通人，苏州市职业大学吴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陈 瑞

①吴恩培：《吴文化概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②《光绪常昭合志》卷22《人物志一·先贤·言氏附大宗世系》，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320页。

③④《四库全书》卷80《集部·别集类·晦庵集》之《平江府常熟县学吴公祠记》。

⑤同治《苏州府志》卷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⑥钱泳：《履园丛话·丛话十九·陵墓·周先贤言子墓》，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350页。

(上接第83页)

清代中叶国史馆纂修《儒林传》时候所形成的看法不无关系，桐城学者当日百计不得跻身《儒林传》，无奈之下只有寄望后世公论，但就其后的历史事实来看，他们的希望并未实现。

四、结论

作为一部清人自撰的当代学术史，清国史馆《儒林传》本身就是清代学术发展变化的产物。本文通过对该传初稿编修体制的分析，认为这部由阮元主导编修的传稿，在体制的拟定中效仿《明史》，只设儒林传，不为道学家立专传；在入传人物的确定中则偏向汉学家。通过对

桐城学者的学术主张和言论的分析，本文认为，清国史馆忽视这些学者的经学成就，而将其列入较为时人所轻视的《文苑传》中，反映了汉学学者利用学术史编修以扬汉抑宋、为汉学争取儒学正统的目的，以致时至今日，桐城派依然被主要视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学者也主要被看做是文学家，他们在古文、辞章之外的其他成就，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作者简介：马延炜(1982 -)，女，陕西延川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陈 瑞